

引 言

我国古代美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这种代表东方古代文明的美学，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就必须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中华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内涵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精神文化中，它又包括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诸如各种思想学说、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等等。在这些因素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文学艺术和美学，和诸因素之间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和美学就不能不把它放在这个国家民族的整个文化背景下，从多方面进行透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在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注意到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学说，起了重大的作用，产生难以估计的深远影响。可以说，抽去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学说以及由于它们的影响而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要谈中华民族文化，那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撇开儒、道、佛三家美学思想的影响，去研究我国古代美学，也是很困难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儒、道、佛三家的学说，长期以来，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有各自独立而互相排斥的一面；但在矛盾斗争中，又不断互相渗透、融合。无论是历代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还是在人们的社会习俗、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不难看到这种融合的痕迹；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这种迹象尤为明显。虽然，历代文学艺术具有自己的历史风

貌，不同的作家也有不同的思想和作风，但是，我们也可看到儒、道、佛三家学说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那里，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审美意识的影响更为深远。当然，这种影响成分，并不是机械的量的组合，而是新的质的化合，我们很难作出定量分析，但是在每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审美意识中，都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基因。这种融合，都意味着创新，无论是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也无论是意境理论，或是妙悟、神韵、性灵诸说，无不如此。

当然，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形成，因素是极其复杂的，有内因、有外因，有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以我国古代文化而言，在儒家、道家学说尚未形成之前，早已有悠久的原始文化和上古文化。所以，我们不能说儒、道学说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各家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古代文化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使之从理论上获得高度发展，这是一次飞跃。我国各族人民，各个地域所产生的文化，在以汉文化和中原文化为主流的总体文化中，不断获得融合和发展。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等，就是对这些文化作了理论总结和发展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说对我国两千多年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佛学，虽是外来的学说，但当它传入中国之后，既不被一概排斥，也不是全盘照搬，而是被吸收、改造，和我国传统的一些思想学说融合，形成中国式的佛学。于是儒、道、佛各家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学说，在互相斗争而又互相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形成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特殊文化结构，形成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种无形的精神网络。而这种民族化的文化结构，也并非绝对的封闭系统，在长期的社会变革、民族融合、中外交交往中，不断吸收外来的、新生的种种文化营养，使中华民族文化既保留自己的传统特点，又不断发展变

化，显示出我国古老文化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只有不断吸收新的营养，才能获得发展，生命长存。

我之所以提倡对儒、道、佛美学思想作系统的、综合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对我国古代美学作一番整体审视，而不是孤立地去看一家一派或一时一地的美学现象。而在整体审视中，又把眼光聚焦于儒、道、佛三家美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相互关系上，在它们之间既各自有独立体系又不断融合的并存互融的过程中，透视我国古代美学的基本特征。概括而言，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从儒、道、佛美学思想的并存互融中，看到中国古代美学的丰富多样性。虽然，在我国数千年文化史上，儒学看似占有主导地位，但在美学领域，道、佛两家的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在某种意义上说，老、庄思想，禅宗的思想，在更深层次上影响到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因此，我国古代美学，并未出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局面，而是以儒、道、佛美学思想并存互融为主体的多元统一的格局，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美学理论。

第二，从儒、道、佛美学思想的并存互融中，看到中国古代美学的整体包容性。在我国美学史上，虽然也出现儒、道、佛不同学派的争论，也出现过它们之间的激烈斗争，甚至演化为政治斗争。但是，在斗争中并未出现甲消灭乙，或乙消灭丙的情况，最终却是在斗争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而又长期并存，形成中华文化大系统的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所以，我国古代美学不能说是以某家某派为代表，应该说它是以儒、道、佛美学思想为主体而又吸收多种美学思想、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整体，是多元美学思想融合的整体结构，是一个互融互补的美学大系统。

第三，以中华文化为大背景的中国古代美学，无论是儒家美学思想或道家美学思想，都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上的产物。

就以佛学而言，它虽是外来的学说，但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也逐渐中国化了。再加上多民族的文化艺术的涵养，使得我国古代美学，无论是审美心理、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各个方面，都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

关于儒、道、佛美学思想，学界早已有人研究，如前些年出版的多种“中国美学史”中，都列有专章谈到。儒道互补、庄禅融通的见解，亦有人论及，但系统地把儒、道、佛美学作比较研究，并阐述三家融汇的综合影响的专著却还少见。为此，我在十五年前撰写出版了《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一书，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较系统地论述了儒、道、佛美学思想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特在该书的基础上，以章节的形式作了修订和补充，以期使之更系统化，便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美学作参考。

第一章 儒道佛美学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

儒、道、佛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也就是说它们是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大背景下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所以，我们研究儒、道、佛美学思想，就必须先了解与之血肉相连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只有溯本追源，才能了解我国古代美学藉以孳生繁衍的文化生态，认识它产生和形成于中国这古老的国度的必然性。

中华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也就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形成，与汉文化有直接联系，同时又辐射到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中，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佛教虽来自外国，但传入中国之后，逐步与本土文化妥协和融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就其文化实质而言，亦已成为与儒家和道家文化并存而且不断互补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研究儒、道、佛美学思想，更多地就注意到它们与汉文化的关系，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本书在谈到中华文化时，虽包括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民族文化在内，但在具体论述时，更多地却还是涉及汉文化，就是这个原因。

第一节 中华文化的地域差异

一 中华文化的产生、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影响

著名的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指出：“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他说的这三个根源也适用于各种文化现象，包括文学艺术的产生。他所说的“环境”，是指“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物质环境、社会环境。他说：“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他举例说，有时气候产生过影响，有时国家政策起着作用，有时社会的种种情况也会打下它们的烙印。^①泰纳在研究人类文化的产生时，注意到自然环境所起的作用，这是无可非议的。他明确指出，自然环境只是“环境”中的一种，而环境又只是产生人类文化的三个不同的根源之一。当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考察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时，自然也不会忽略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的影响，当然也就不会否定自然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地说，当人类处在蒙昧时代或科学极其落后的时代，自然环境对他们起支配的作用，他们的文化自然也取决于自然的影响。随着科学文化的昌明，自然的支配力量减弱了，甚至达到人力可以支配自然的地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文学

参看《英国文学史·序言》（杨烈译《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 152~15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艺术的影响仍然存在，虽然不能说是决定性的。

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就是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尽管在阶级社会里，各个时代的文化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但同时也打上了民族的、自然环境的、时代的烙印，而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带来的烙印，往往是可以超越阶级的。华夏民族和少数民族，是在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下形成的。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地理条件复杂，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所以，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多地域的文化。如果我们进行细致的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在共同的文化圈内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性文化。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有种种原因，诸如种族的、环境的、时代的原因等等，其中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可否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我国整体地势而言，是西部高而东部低，地形极其复杂，高原、山地、丘陵地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在高原和平原之间，海拔悬殊极大，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珠穆朗玛峰海拔竟达8800多米；而东南沿海平原地区海拔则在50米以下。由青藏高原西北的帕米尔高原发端延伸出许多山脉，其主要走向分东北和西南，也有南北走向的一些山脉，形成我国境内纵横交错的山脉网络。由于地势由高至低的极大悬殊，形成高原、盆地、平原的不同地域。在高原地区又形成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小盆地。这些不同的自然地理，形成我国辽阔幅员中的千差万别的地域，它们具有不同的气候、水土和资源；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人民，也就具有不同的生产条件、生活习惯和文化形态。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各地域之间很少交往，几乎形成各自封闭的、发展缓慢的地域性经济和文化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封闭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但是，地域性的生产生活和特色仍然保存。这不能不说是形成我国多种地域文化的重要原因。我们只要看看我国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和民间文艺，就

足以说明这一点。产生于西北地区的秦腔，和浙江的越剧比较，自然是大异其趣；而陕北的信天游，东北的二人转，和云南的民歌比较，也具有各自的鲜明风格。形成这种差别，显然就是由于地域的不同，因为地域的不同，带来人们在心理素质、性格特征、风俗习惯上的种种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

自然地理的差别，包括许多自然条件的差异，其中特别是江河湖泊、气候土壤的影响，直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有联系。一般说来，高寒山区、高原地区，缺少肥沃的土壤，也没有江河湖泊之利，气候寒冷，缺乏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所以人口稀少，生产落后，文化也自然落后。而平原地区，江河纵横，湖泊遍布，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生产比较发达，生活比较富庶，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我国历史上的华夏文化的摇篮，基本上都是在具有上述条件的地区。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对此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于黄河流域，钱穆则认为：

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黄河本身，他所凭借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

我们若把中国古史上各个朝代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分配在上述地理形势上，则大略可以作如下之推测：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极权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部，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极权地带。这一个黄河的大隈曲，两岸流着泾、渭、伊、洛、汾、涑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的三角极权地带里面，都合宜于古代农业之发展。

钱穆还认为：唐虞周三系文化逐渐融合而成为“中国古代较为西部的一个文化系统”。而殷商文化则发祥于黄河流域东部之河南安阳一带直到山东西部，这是“中国古代较为东部的一个文化系统”。也即是我们常说的殷墟文化。^①而这一带的自然地理，多属平原和沼泽地带，也适宜于农业的发展。所以，就三代文化性质来看，都属我国古代的农业文化，这一点，我们从上古神话中，从甲骨文提供的资料中，从《诗经·国风》中所描写的农民生活以及对节令的叙述，都可以得到证实。

我国古代文化的发源，从现代考古所获得的资料看来，不仅仅只是黄河流域的三代文化。其实，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和沿海的广大地区，在很古的时代，亦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古代所说的荆楚、百越，包括南方的广大地域和居住在那里的土著居民。虽然，周秦以后，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和长江以南的“荆蛮”各族逐渐融合为汉族，但仍保留有各自地方特色的文化，如楚文化，就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系统。上述种种现象表明，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是自然的现象。自然条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是地理形势的影响，在我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原、平原、丘陵、盆地……等等各种不同的地理形势。这些不同的地理形势，具有悬殊很大的不同自然条件，使得各地区的人民生活存在极大的差异，形成不同地域人民的不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以至于生理上、个性气质上的差异，从而带来文化和审美意识的差异。一般说来，高原地带、高寒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发展水平低下，文化也比较落后；而平原地带，自然条件较好，人们依靠那里的土壤、水利、气候各种有利

^① 《中国文化史导论》 1~3 页，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条件，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光辉的古代文化。由于地理形势的复杂，由于错综的山脉纵横割据，形成大大小小不同的地域，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各地域之间甚至是隔绝的，即使有交往也不是经常的、大量的。因此，就容易形成多种部族、多种政治、多种文化形态。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地理形势具有不同的气候，譬如气温的悬殊、空气湿度的差别、雨量的多少、风力的大小……我国幅员广阔，气候复杂多样，总的来说，大部分地区属于北温带和亚热带气候，但有的地区四季分明，有的地区四季如春，有的地区长夏无冬，而有的地区则全年无夏。这一切，都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生产和生活，也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理、心理素质的形成。大沙漠的荒凉，大草原的肥美，平原上的沃野，江湖泽畔的富饶，……这一切，无一不与气候带来的影响有关，而这一切，又无一不直接影响到各地域文化的形成。

最后，我们特别注意到，与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是黄河、长江。这一点是为考古学、历史学，以及文学艺术的大量资料所证明了的。前面我们引用钱穆的大段文字，已从三代文化的形成及其受地域的影响说明这个问题。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一处、一个地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周口店的北京猿人、云南的元谋猿人，还有其他考古发现的古猿人遗址，都表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不是一处而是多处，也说明我国古代文化的源头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但是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根据史料的记载，古代华夏文化的源流，绝大多数产生和发展于长江黄河流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地带，这也是历史事实。从水利上看，自古以来黄河虽然有“百害”之称，但是黄河的众多的支流，却灌溉了辽阔广大的土地。由于黄河的利和弊的自然条件，在几千年前，就促进了其流域两岸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下，最早形成了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时代的文化，以及后来的夏、商、周各代文化。我国古代的社会制度、人伦礼法、生活习俗、审美意识，可以说都与农业文化有关而具有鲜明的特色。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更适宜于农业的发展，其自然条件与黄河流域有差别，因此，发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而融汇于华夏文化之中。但是，它的农业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和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之间，具有内在的共同点，这就是我国数千年文化形成多元统一的结构特征。

以上我们简略地谈到我国自然条件给予文化发生发展的影响，它是我国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自然条件，对我国传统文化民族特色的形成无疑有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说这就是决定我国传统文化性质的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应该说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世界观等等。

二 地域文化的差异

从地域的不同去区分我国的文化区域，这当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数千年文明史中，我国的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不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所以要把它们作出绝对的区分是很困难的。但是，就其大概而言，则仍可以看出因地域文化之差异而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区域。不同的文化区域的地方特色，多半表现在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也反映在人民的个性气质、心理素质等方面，更突出的是表现在文学艺术中，尤其是民歌民谣、地方戏曲等领域中。在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趣味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前辈学人已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从历史上看，在我国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华夏民族的形成及其文化的发展，主要有南北两大系统，这和我国的地理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政治上的几次大分裂，

也主要是南北的分裂，例如，三国鼎立时的魏、吴、蜀南北政权的分割；东晋王朝偏安江左以及后来形成的南北朝对峙局面；南宋王朝偏安江左与北方金元政权对峙的局面等等。自然地理的南北差异，政治上的南北分裂等等原因，都使得南北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色。关于这个问题，《北史·文苑传》中早已有一段颇有见地的分析：

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为什么南北文化有这样的差异呢？刘师培作了如下的分析：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①

虽然，刘师培谈得十分概略，但是，他看到南北文风的不同，和地理上的差异以及人民生活的不同有关，这是有见地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在先秦两汉漫长的岁月里，我国文化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为中心的不同地域，曾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形成夏、商、周三代文化，从出土的甲骨文以及青铜器，可以看到三代文化的大致面貌。周代文化，是夏、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无论是农业生产、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

典章制度，或者是文学艺术、科学文化，都有了较高的水平，因此，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 孔子对三代文化特别是周文化作了系统的研究，对重要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体系。后来，孟轲、荀卿等对儒学有了重大发展，使之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标榜和遵奉的所谓“正统思想”。以三代文化为正统的文化思想，反映了我国古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化区的地域特色。就学术而言，北方盛行经学，孔、孟所在的齐鲁文化，无疑是以经学为宗，是一种重社会人生、重实际应用的学问，其文风可以说是“词义贞刚”、“理胜其词”。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北方各诸侯国中亦以齐鲁文化为旗帜。就诗歌而言，被列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其中绝大多数的作品，无疑也是北方文化的产物。其中的《大雅》、《小雅》和《颂》从各侧面反映了商、周以来的各统治阶层的政治状况和思想意识；而《国风》则更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各诸侯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开创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它以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对思想感情的真实描写和对历史的如实叙述而形成现实主义的鲜明特色。

与此相对照，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包括广大的“荆蛮”之地，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和人民生活的差异，形成其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系统。就学术而言，老庄学说的产生，就具有南方文化的鲜明特征，它是一种以虚无为本，充满幻想的超现实、超功利的学说。其文风有“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②的特点，有如天马行空，富于幻想，而对现实人生、伦理道德、礼法制度，则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就形成了与

① 《论语·八佾》。

② 《庄子·天下篇》。

儒学对抗的、影响十分深远的另一种文化体系。老、庄思想的产生，当然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楚文化的影响是主要的。而楚文化的产生和地理条件的影响也分不开。再就文学领域而言，在楚国文化土壤和民间文学的哺育下产生的《楚辞》，也具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其想象之丰富、文辞之瑰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伟大的诗人屈原是在楚文化熏陶中长大的，他熟悉楚国民间风俗和民间文学，他把流传于民间以及古代典籍中记载的许多神话传说，用诗歌艺术形式加以表现出来，再赋予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丰富的艺术想象，使之成为独具特色的诗歌专集而与《诗经》并峙。历来《诗》《骚》并称，既表明《楚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又表明它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与《诗经》媲美。

南北地理的差异，影响到文化上的差异，从而也形成人们审美意识的差异，由上面所谈的现象，也可以得到证明。当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南北的这种差异，不断地得到交融，经学的普遍传播 老庄之学的广泛影响，《诗》《骚》的流传 这是不分南北的。但是，南北文化差异的痕迹，地域文化的特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存在，这就是直到今天，我国各地区的戏曲、民歌、舞蹈以及许多民间艺术，仍然表现出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原因。

我国文化史上，南北文化的差异，只是一个大致的区分。如果进一步区分，还可以分出许多类型的地域文化。就北方而言，历史悠久而影响最大的是齐鲁文化，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两国所在的地域。鲁是周室分封的诸侯国，国都在山东曲阜；齐是周王朝封给太公吕望的领地，建齐国，春秋时势力强大为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首都在今山东淄博。现在统称齐鲁文化，主要是指历史上齐、鲁两国所创造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但其他学派也很活跃，许多学者曾集中到稷下，齐桓公设稷

下学宫，提倡各种学派的自由讨论，百家争鸣。而鲁国又历来是周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具有高水平的齐鲁文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有见地的评述：

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齷齪。

从这里可以看出，齐和鲁两邻国，由于自然条件有所不同，其文化习俗尚存一定差别，齐国人“好议论”，鲁国人则“俗好儒”，前者“宽缓阔达”，而后者则“齷齪”。但从大范围而言，齐、鲁相邻，地理环境大同小异，随着历史的推移，形成齐鲁文化。同是北方，河北一带的燕赵文化，陕西长安一带的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相比较，也有很大的不同。

就南方文化来说，也可以分出若干地域文化，例如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其中，地域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荆楚文化，也即是历史上以楚国为核心的文化带。战国时代的楚国，疆域辽阔，其北与中原韩、魏、宋、齐为邻，南至苍梧与百粤^①为邻，西与秦为邻，东至海，其地包括湖北、湖南以及安徽、浙江、江西等省部分地区。旧都为郢（湖北江陵附近），后迁都鄢（湖北宜城县）又迁都寿春（安徽寿县）楚国境内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荆楚文化，并不崇儒，而是崇巫，这当然是和民间风俗有关。从屈原的《楚辞》就可以看到楚国的巫风

^① 百粤，亦称百越。

以及其对文化的影响。王逸在注《九歌》时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朱熹补充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乐歌舞以娱神。”这种巫文化，当然和以经学为主的齐鲁文化大不相同，其人神交通的幻想以及种种虚构的鬼神世界，和老庄的虚无哲学，就其本质来说则是一致的。

三 地域文化的交流

我国地域文化之复杂多样，可以说是举世少有的。但这不等于说我国文化永远处于小区域的互相孤立的状态。随着民族的交融、地域间的交通，地域文化也不断交流和扩大。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诸地域，作为统一的中国版图中的各个部分，各个地区的文化既有差异的一面，又有其共同的一面，这就是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构成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的基础。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在我国历史上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悠久的历史过程，在这种渐变而不是突变的过程中，各地域文化之间产生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

从我国的历史发展看，地域文化的交流，往往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是同步进行的。促进这种融合的渠道，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国家的统一、政令的统一、版图的扩大，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交流。如果说，我国远古时期的文化，是部族分散的小区域原始文化，那么，传说中的黄帝、炎帝以至尧、舜诸帝，是各部族文化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融合。也就是使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和中下游地区，甚至于长江流域地区的文化实现了初步的融合。这种融合，无疑是和统一的部族联盟国家的形成分不开的。夏、商、周三代已经形成了在更大的版图内实现统一的君主国家，从新石器文化到青铜器文化，已可看出华夏文化初步形成的雏形，

也可看出夏、商、周各部族地域文化融合的轨迹。例如，关于九鼎铸造的传说，就表明早在夏朝已进入青铜文化时代，而且所铸九鼎上的彩饰，象征九州文化的交融。《左传》宣公三年有这样一段话：

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万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九牧就是九州，据说大禹治水后，把我国古代国土分为九州。据《尚书·禹贡》中记载，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后代史料所记，小有出入。总之，就是我国古代关于中国版图的概念。“远方图物”就是把九州的不同标志（可能是图腾）铸于鼎上，所以才说“铸鼎象物，万物而为之备”。显然，这是把九州作为统一国家的象征。因此，在夏、商、周时代，把九鼎的归属，看作是君权之所在，直到春秋时期，楚子问鼎，被认为是有篡夺皇权的野心。又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既是国家的一统，也意味着不同地域文化在一统过程中有了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七雄，中国分裂为一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这些分裂的国家互相争夺兼并，领地时有变化。但就其文化而言，由于地域不同，民风不一，所施行的政教也有差别，所以，也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交融和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虽然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文化悲剧，但是，在促进各地文化交融方面，应该说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所以秦始皇制定了“车同轨”、“行同伦”、“书同